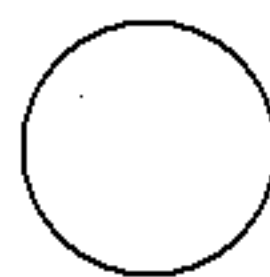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12

一九六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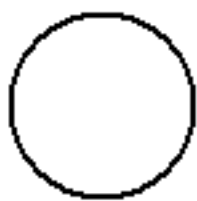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次

调查研究工作 本刊评论员 (1)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李维汉 (5)

对目前音乐创作中几个问题的

理解 吕 驥 (27)

“做笨事” 闻 和 润 (33)

西德垄断资本和它的向外扩张 严 希 (35)



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次调查研究工作

本刊评论员

无论研究历史问题或者现实问题，要得出科学的结论，都必须搜集丰富的可靠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独立的研究。这是任何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举出一个事例来谈谈。

十年前，即一九五一年，我国学术界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和批判。这次讨论和批判，是在全国解放后不久思想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次胜利。在这次讨论和批判中运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给思想工作和学术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武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个渺不足道的人物。因为他以乞丐的身份创办“义学”，受到封建朝廷的奖励；在他死后，不但反动统治者不断地给以赞扬，而且有许多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把他歌颂为一个“英雄人物”。这种对武训的赞美影响很深，以至在全国解放后，还有人特意把他的生平拍成电影，企图证明，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也必须在武训面前低头膜拜。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电影《武训传》开始公演，各地报刊上除了个别的文章提出批评外，几乎只是一片赞扬，暴露了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

在文化领域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认识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迅速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北京和各地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批判，发表了一些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的批判文章。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团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次讨论和批判，对于划清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界限，划清人民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界限，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武训的历史地位本来是很清楚的。人们如果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为指



导，不为资产阶级偏见所迷惑，实事求是地考察武训生平的基本事实，是不应当在评价武训的问题上迷失方向的。但是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一个长时期中已经为武训的生平加上了许多粉饰和曲解，使许多人受到迷惑，所以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必须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就要求进一步从大量的经过审查鉴别的事实材料中，考察武训所处的历史时代，考察武训的思想行为的具体内容及其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次讨论中，正是这样做的。人们不但从事文献史料的多方发掘，而且进行了对武训活动地区的实际调查，因此，掌握的事实材料越来越丰富全面，对武训问题的批判也就越来越深刻、准确和具体了。对武训的研究还引起了对于和武训同时、同地区的农民革命战争，即以宋景诗为首的黑旗军的研究，不久后，还有人进行了关于黑旗军的实际调查。这种从大量的可靠的事实材料中引出科学结论的做法，活生生地显示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解决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威力。

从关于武训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中可以看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要求，在研究任何具体人物和事件时，都必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武训歌颂者却是脱离武训生活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去孤立地、随意地解释问题。马克思主义要求在研究一种精神现象时，必须考察它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它的具体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武训歌颂者却是撇开具体的阶级内容去抽象

地谈论武训的什么“崇高精神”。马克思主义要求，在评判人物的活动时，必须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考察，并以社会实践效果作为最后的标准。武训歌颂者却是完全不管武训兴学在实践上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事实，武断地把武训的兴学动机说成是“为了穷孩子”。十分明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这些要求，就一定要搜集和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例如，经过对武训家乡的农民斗争历史的详细考察，发现了武训的家和宋景诗的起义地点虽然相距很近，而武训却选择了投靠地主的道路，从而进一步揭露了武训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的具体态度。又例如，经过对武训办学的全部过程和他的“义学”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师、首事人和学生成份的详细了解，具体证明了武训办“义学”，不论就其动机和效果来说，都是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他的“义学”是在地主阶级把持下办起来的。又例如，经过了对武训的高利贷剥削和土地剥削以及他的种种社会关系和思想行为的详细了解，完全证明了他的所谓“奇操苦行”，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剥削资本，同时保持一个欺瞒的外衣，爬到封建统治者宝座的脚边。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足够的丰富材料，就不可能进行揭露事物内部联系的具体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要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实际材料，必须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武训历史调查团直接深入到事件发生的地点，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页。



并通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力求获得丰富的可靠的第一手的材料。他们把明确的目的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结合起来。他们不但尽力搜集和发掘正面材料，同时也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反面材料，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和利用这些反面的材料。他们除了搜集和整理各种书面材料和实物材料外，还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人，包括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他们调查了武训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情况，同时对武训生活的那个具体时代、具体环境里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情况，也做了细致的了解。他们的调查是有系统的，同时又是重点的，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典型，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们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了比较、核对和鉴别，对于提供材料的人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态度和谈话时的表现作了细心的观察和分析。有些歌颂武训的人，也曾经做了一些调查，但是那同科学的调查是根本不同的。调查者自己后来说，他们并不去“向被访问的十几位父老们去打听和探询武训的真实情况”，而“只根据自己主观上的需要去选择历史资料和调查资料”^①。抱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即使听到一些真实的重要的材料，例如他们“听说过一次有人提到黑旗军，也没有去研究追问”^②，当然就更谈不到从这个线索去探寻出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来了。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掌握必要的可靠的资料而妄作论断，是根本违反科学态度的。如果不是从大量材料中经过比较、分析，找到有代表性的材料，而是任意地拿个别的材料作为自己的根据，所达到的结论也只是片

面的、错误的。虽然有了较多的材料，但是没有经过科学鉴定，分辨真伪，在这样的材料基础上作出的判断，也是不可靠的。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会碰到不少重要的材料没有发掘出来，已有的一些材料受到种种的歪曲，其可靠性很值得怀疑的情况。所以科学研究不但要搜集大量的材料，而且要对搜集起来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审查和考订的工作，清除许多蒙蔽事实真相的迷雾。对于任何有疑点的材料，都不要轻轻放过，而要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对和分析，弄清真相。缺少批判地审查材料这一步工作，也不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在武训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些人囿于传统的成见，轻信已有的所谓“定论”，根本不想去占有第一手的材料，进行独立的审查和研究，就轻易下判断，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地写起歌颂文章来。有的人写歌颂文章，手头唯一的材料就是一本《武训画传》。采取这种轻率的盲从的态度，当然说不上是进行科学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但要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不受假象的欺蒙，不受某种成见的束缚，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为了掌握全面的材料，鉴别材料的真伪，有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科学工作者必须亲自动手，付出辛勤的劳动。科学工作者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已有的真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作出适当的判断；在材料还不完备的时候，要继续进行调查，在新的调查研究的

^{①②} 《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1页。



基础上，发展或者修改原有的判断，以至作出新的判断。

从上面所谈的几个问题中都可以看出，人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是同他们的立场、观点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观点，是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立场决定了它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是尽可能揭示事件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而持有反动立场、观点的人，他们的反动观点和历史真相从根本上说来是对立的，他们不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对待事实材料，因为研究和揭露历史的真相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他们总是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采取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有些武训的歌颂者对于史实就是采取随意歪曲，或夸大或缩小的态度，对于不能歪曲的事实则干脆加以掩盖，甚至捏造事实。他们为了证明武训是如何的“高尚”，就捏造出所谓武训拒穿黄马褂一类的谎言，同时却掩盖了武训的一些丑恶事实材料。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总的说来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对于某些具体的事实材料并没有说错，只是他们对这些资料的解释或者从这些资料引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有时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总的说来持有正确观点的人，在研究问题时，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科学的方法，而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对待一切社会历史问题时总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例如我们总是站在进行革命斗争的人民的这一边，而反对那种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势力和人物。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必须贯彻在对事实材料的科

学分析中，而不能用以代替科学研究。如果忽视了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历史规律的认识，就可以任意地选用史料，任意地断定这种史料或那种史料的价值，甚至如果为了表现倾向的鲜明，走到了离开事实材料或曲解事实材料的地步，结果就会走到反面，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也就丧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所以，在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把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

在科学研究中，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周密的调查，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引出科学结论，这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的态度的。为科学进步开辟正确道路的，使科学研究得到积极成果的，正是这种有生命力的科学的态度。相反地，任何形式的概念游戏，徒托空言，随意找出片断的、偶然的事例加以夸大，用来凑合某种主观臆造出来的观点，这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只会把学术工作引入歧路，阻碍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研究工作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办法，对实际情况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找出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采取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主观主义态度，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的学术工作的优良传统。十年前关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讨论和调查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学术界必须更好地发扬这个传统而不能违背这个传统。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

李 維 漢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它已经胜利地经历了民主革命阶段，又在胜利地经历着社会主义阶段。在它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点。下面这些，是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 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
- 四、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 五、担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
-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 七、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的发展规律。现在，我们依次来论述这些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其他一切特点，都是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取得彻底胜利，应当由谁来充当领导者？是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还是可以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来领导？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发生过长期的斗争的。历史是最好的公证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只能和必须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充当，而不能由民



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此外还有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针对这种阶级组合的情况，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一面被迫抗日、一面又坚决反共的两面性，并且鉴于过去两个时期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片面政策的错误，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斗争，克服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抹杀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反对划分左中右，主张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的同意，而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和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了一个对全局有决定影响的主要环节，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尽一切可能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争取地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有联系的人们共同抗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停止执行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发挥民族资本和私人经济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民主人士共同奋斗，党采取了“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联合政府政策。就这样，党在根据地内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并把其他抗日阶级阶层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于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就使敌伪军日益陷落在中国人民的分割和包围之中，不能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就使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有了榜样，看到了胜利的前途和人民共和国的远景，坚定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信心；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强有力的支柱，有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有力量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且阴谋分裂、准备投降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之不敢公开破裂投降，并且胜利地打退了他们为公开投降、全面内战作准备的历次反共高潮。总之，由于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党比较顺利地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从而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伟大的发展和成功，积累了完整的和丰富的经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果，革命武装的成果，革命根据地的成果，党的建设的成果，连同各方面丰富的经验在内，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之下，采取了反革



由共产党领导和发动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线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路线，只有共产党才能提出和贯彻执行这个路线。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能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五四运动“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①，因而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但是，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还缺少工农联盟作基础，因为农民这个革命主力军还没有参加到运动中来；更缺少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自觉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跟着逐渐建立起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逐渐形成起来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話），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②。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阶段中，是要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从而使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经过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虽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中，曾经有许多人长期地固执和散布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旧民主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③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要坚持资本主义的道路，谁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④。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跌入附和蒋介石反革命的泥坑，就是这个道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民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5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7页。

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④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页。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随着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转变，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而且可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因此，从三十年民主革命的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转变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统一战线。

在建国的头三年，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斗争，恢复了国民经济。这些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为全面进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正式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业和其他个体经济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和平的方法，逐步地进行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而人民手里又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能够经过和平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很快，在一九五五年冬天和一九五六年春天，就相继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都进到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时期内取得的伟大成果。但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还远没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也还需要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不甘心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导下，展开了农村



主統一战綫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階級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我們的偉大的工农联盟，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即农民战争）中，逐步发展和鍛炼出来的。它已經走过了民主主义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合作化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現在又已經走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阶段。不論在那一个发展阶段上，工农联盟都是基本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基础。毛澤东同志指出：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階級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階級的联盟”^①。刘少奇同志也指出：“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們無論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支最偉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階級只有依靠这个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軍問題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設时期仍然是这样。”^② 其他的階級、阶层、集团，他們参加革命和参加統一战綫的程度如何，主要也是以工农联盟的力量为轉移。沒有工农联盟，就沒有真正人民革命的統一战綫，就沒有真正的革命的胜利。所以，不論是民主革命阶段，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不論在革命战争中，或者建設工作中，毛澤东同志总是把工农联盟問題放在首要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指导全党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因为我們党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就使人民民主統一战綫获得了坚实的基础，有力量去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非劳动人民，結成广泛的統一战綫；有力量去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力量去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

在工人階級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里面，主要的同盟者是民族資產階級。这个联盟，对于工农联盟說来，是一个非基本的、輔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不可缺少和重要，主要地是因为中国民族資產階級是一个爱国的階級，在政治上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經濟上和文化技术上有重要作用。他們的多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采取保持中立的态度；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又有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階級爭得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或者至少使之保持中立，就有利于爭取其他的中間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着联盟，就不但有利于繼續孤立敌人，而且能够利用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技术上的积极作用，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對他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明紳士是从地主富农階級中分化出来的、带有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頁。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5頁。



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同。开明绅士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多少力量，在经济上也没有多少作用，但是，争取和团结了他们，有利于分化和中立小地主和富农，并且对于争取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都是有益的。

在这第二个联盟里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集团参加。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对于停止内战，实现对日抗战，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合作过程中，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但是，由于党和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仍然能够利用这种合作，达到了集中主要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抗日战争中大大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不但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而且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决定意义的条件。在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指出：“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①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预见。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两个联盟的对立的统一。四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正确地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正确地处理两个联盟的关系，这就是：第一，放手发展和加强工农联盟，使它真正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依靠；第二，尽可能扩大第二个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它们互相促进。

从四十年来的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很快地促进了整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工农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后来，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不敢继续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在北伐战争的后期，甚至不惜损害工农联盟以迁就地主资产阶级，结果反而使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反动力量更加上升，终于把革命引导到不可挽救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和发展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曾经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坚固的基础。但是，在这个期间，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只要工农联盟，反对工人阶级同非劳动人民的任何联盟。“左”倾冒险主义者以为只有这种政策才是最革命的政策，结果反使工农联盟被孤立，革命再一次遭到很大的损失。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总结

^①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49页。



了过去两个历史时期的經驗，放手发展工农联盟，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組成广泛的統一战綫，正确地发挥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革命就节节走向胜利：首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經過三年的解放战争，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反动統治。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党和毛澤东同志繼續发展了正确处理两个联盟之間的关系的經驗。一方面，在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之后，接着就领导农民逐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起来，并使人民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农产品，借以縮小资本主义的市場，直到堵死资本主义道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經過国家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不仅孤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起了有益的作用，而且經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向资本家取得工业品，作为向农民交换农产品的重要的輔助手段，对于促进农业合作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五五年冬季，农业合作化高潮首先到来，它推动了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都在一九五六年春季出现了高潮。接着，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我国胜利地进行了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革命运动中，經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工农群众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使“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們不想变也得变”^①。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轉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願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在三面紅旗的指导下，我們又在各項建設工作中实行领导干部、专业人員和工农群众三部分人員相結合的办法，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一种形式，因为“三結合”中的专业人員有一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

四十年来，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两个联盟，就是这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相輔相成，互相促进，把革命一步一步地不断推向前进，不断推向胜利。今后，我們仍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繼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发挥两个联盟互相促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設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非劳动人民的根本改造，使他們化为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那时，我国人民的广泛的統一战綫将变为各部分劳动人民之間的联盟。

三、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統一战綫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統一战綫中的两面性，或者叫做二重性，所以，这个統一战綫中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一方面对工农联盟有着輔助

^① 毛澤东：《介紹一个合作社》。《紅旗》杂志 1958 年第 1 期。



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另一方面，这个联盟又对工农联盟有消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曾经吃过大亏。为着正确发挥第二个联盟的辅助作用一面，防止它的消极作用一面，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善于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地对待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远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就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分析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时候说：“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①“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光辉的思想，却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拒绝和埋没了。他们不是从右边，就是从“左”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见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反动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积极性一面，因此，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根据过去两个时期的经验和抗战时期的新的经验，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公式，这一个光辉的思想和正确的政策才为全党所了解和掌握。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③

^{①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9页。

^③ 《〈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9页。



“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②。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又联合又斗争，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又联合又分裂，即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一种是统一战线内部的又团结又斗争。一般说来，又联合又斗争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分别地说，这里讲的又联合又分裂，主要指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

由于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即是代表中小资本主义成分的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而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而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统治。这些都是他们和大资产阶级相区别的。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系，并且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的、政治的地位，规定了他们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两面性，即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规定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必然处于动摇不定的地位，有参加革命的可能，也有附和反革命的可能；他们中的少数依附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的右翼分子，则是革命的敌人。总的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这样：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但残酷地压迫劳动人民，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向三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而奋斗。在这种形势下，只要共产党对这个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就能使他们的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都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坚定不移地采取争取的政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而

①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59—760页。

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0页。



蔣介石反动統治則沒有放松對他們的打擊。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明確地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們中間的不少分子，曾經附和了蔣介石的反動。但是，決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認為那個時期我們在政治上不應該爭取他們，在經濟上不應該保護他們；就認為我們在那個時期內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不是冒險主義的政策。相反地，那時我們的政策，仍然應當是保護和爭取他們，以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去反對主要敵人。”^①自抗日戰爭時期以來，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堅定地執行了這個政策，終於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多數由動搖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中間地位，轉到人民革命這方面來，表示擁護人民共和國和共產黨的領導。這不但孤立了敵人，而且造成了一種可能，即爾後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使民族資產階級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比較詳細地說過了。

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要根據他們的兩面性的不同情況，對他們適當地實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這就是，對於他們的革命性方面，依據具體情況，適當地實行團結的政策，而對於他們的妥協性方面，依據具體情況，適當地實行批評或者鬥爭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堅定他們的革命性，克服他們的動搖性，使他們同我們建立聯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忽視他們的革命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對他們實行團結的政策，固然不能爭取他們；如果忽視他們的妥協性一面，不在这方面對他們實行批評或者鬥爭的政策，也會助長他們的動搖，同樣不能達到爭取他們的目的。同時，我們在对民族資產階級實行這種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的時候，還應該針對他們內部左、中、右三派的不同情況，來分別對待。

在社會主義階段，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這本來是一種對抗性的矛盾。但是由於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具體條件，“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②所以，在過渡時期，黨和毛澤東同志對民族資產階級堅定不移地執行和平改造的政策。和平改造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團結他們願意接受社會主義的一面，而對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面進行批評或鬥爭；也就是求同克異，逐步克服不同的方面，使之同化於勞動人民，同化於工人階級。“為了改造，先要團結。”^③改造的目的，是為了消滅這個最後的剝削階級，而把這個階級的人們同化過來，這更是為了達到更高基礎上的團結。

在中國，大資產階級，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官僚資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壟斷資本。“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

^① 《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7頁。

^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③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0頁。



家壟断資本主义。这个壟断資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階級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結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①从清朝末叶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殖民地化，中国当权的反动官僚、軍閥就逐步买办化，一些买办也逐步爬上統治地位，从而形成了代表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官僚資產階級。在蒋介石統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日本投降以后，官僚資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壟断了全国的經濟命脉。而統治中国中央政权、充当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走狗的蔣、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成了最大、最集中、最殘暴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团。这个壟断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人民的野蛮掠杀和对民族資本的无情吞并的过程，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排挤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而独占中国的过程。四大家族而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团。

大資產階級，在中国革命史上，历来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間的矛盾尖銳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統之下的买办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綫。但是一到他們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們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主要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里主要有两条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

第一条，必須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毛澤东同志說：“我們要把敌人营垒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③我国革命根据地，从井冈山斗争起，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和缺口，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毛澤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利用敌人矛盾的一种榜样。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的条件下，我們还应当根据“利用矛盾，爭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綫上拉过来”^④。同他們暂时地直接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盟，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就是毛澤东同志利用敌人矛盾的又一种榜样。

第二条，大資產階級的本性不会改变。共产党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的經驗都证明，大資產階級即使在参加統一战綫的时候，仍然是很反动的。他們被迫地暂时参加統一战綫，是为了維持反动統治和发展反革命势力，是为了瓦解革命力量和最后地打敗人民。他們在統一战綫中不但极力欺騙拉攏和胁持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势力，而且极力限制打击和破坏共产党

①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頁。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4頁。

③④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3—144、149頁。



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且力求把共产党变成他们的尾巴。到了革命的发展同他们的这种反动目的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要掉转枪口来反对革命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表现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派。党和毛泽东同志本着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蒋介石集团任何微小的抗日积极性都充分加以争取和利用，使之有利于抗战；而对他们反共、分裂、妥协、投降的一方面，则针锋相对地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并且局部地在军事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放手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使蒋介石集团陷于孤立，不敢公开投降日本，不敢完全和共产党破裂。也正是因为这种反动的本性，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就根本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不顾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同他们保持团结、实现和平民主的仁至义尽的努力，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这种种历史事实都证明，希望经过统一战线改变大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可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这样，其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也是这样。

对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推翻了他们的政权和摧毁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后（除了个别的和平起义人士和其他爱国分子，应当很好地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以外），必须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强迫他们接受群众监督和劳动改造，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和政治教育。只有经过长期的监督和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才有可能从反动分子改变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十多年来，经过这样的监督和改造，已经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这种变化。但是，这两个反动阶级的残余仍然是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其中有许多人还无时不在梦想复辟。在政治上充当这两个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在我国，改造大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分子的斗争，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将持续一个整个的历史时期。这方面，不容许有任何的麻痹、懈怠或者放松警惕。

四、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在社会主义阶段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带头走了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革命战争，就是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就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此后，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胜利，尽管革命战争所反对的对象和参加革命战争的同盟军各有区别，但这些战争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依托革命根据地来进行的农民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为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而长期的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为什么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具有这样的特点呢？这是由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一个根本特点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上开辟了这条道路，又在理论上论证了这条道路。远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红色政权即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此后又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②

走这条道路，就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道路。而要走这条创造性的道路，是不能不经过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即教条主义者，硬要在中国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走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的道路。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从已有的经验教训中取得教益，而固执地要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或者要求红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9—630页。



軍进攻大城市。这一場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和教条主义路綫的斗争，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才以毛澤东同志路綫的胜利宣告結束。

統一战綫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統一战綫和武装斗争，是党手中的两个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它們是互相依賴的。一方面，革命战争必須由党所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战綫来負担，党的正确的統一战綫政策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战争是政治的繼續。”战争要胜利，首先要靠政治，首先要打贏政治仗。我們进行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政治性质使它不仅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胜利的必然性。但是革命战争要胜利，还要依靠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孤立和瓦解敌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团结和壮大自己的問題，或者说，就是統一战綫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正确的統一战綫政策，如果我們不能正确地处理各阶级的关系，以达到团结和壮大自己、孤立和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革命战争就不可能胜利，甚至可能遭到失敗。这一点，在我們党的历史上有过丰富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

在另一方面，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統一战綫不論在那一个时期，也不論有沒有资产阶级参加，都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統一战綫”^①。毛澤东同志說：“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組織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②“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沒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③統一战綫工作，是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配合革命战争，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同时，統一战綫必須有坚强的人民武装作为它的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在我国条件下，离开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武装力量，統一战綫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战綫是革命战争的負担者，而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反过来，又可以創造和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統一战綫。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之下，創設黄埔軍校，組織革命军队，举行东征和北伐，曾經怎样造成了蓬蓬勃勃的工农运动和广泛的統一战綫。但是因为共产党在当时还不懂得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自願地放棄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又是怎样使“那时的革命統一战綫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軍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④。民众运动和国共两党合作的統一战綫都一齐垮了台。大家更熟悉地知道，后来，我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以能够击败蔣介石集团分裂、投

① 《〈共产党人〉发刊詞》。《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04頁。

②③ 《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81、592頁。

④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1—152頁。



降的阴谋，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胜利，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坚强的并且日益壮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充当中心支柱。

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经验证明：工农联盟的发展和巩固，主要是经过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而获得的；同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更要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有没有武装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如果没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对武装到牙齿的大资产阶级固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人微言轻”的。相反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手里的武装力量愈强大，革命战争进行得愈胜利，统一战线也就愈广泛，愈巩固，愈强大（如果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話）。总之，没有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强大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领导的、足以战胜敌人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几十年的革命战争，锻炼出来了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这三个法宝，经过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建立了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三个法宝的结晶和集中表现，它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由以实行武装斗争为支柱的统一战线进到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实行和平改造和和平建设的统一战线。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并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社会，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然后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①。我们党早就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统一战线，不仅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是需要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也是需要的。

有人以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统一战线。他们不懂得，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已经有了统一战线的长期历史。在社会主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但是他们愿意留在统一战线之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继续合作。而且，这个阶级是一个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阶级。工人阶级同他们继续保持统一战线，不但对于教育和改造他们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以最大限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



些假說所依据的事实还不充分，不系統，并且由于它还常和抽象的邏輯推理連結起来，就断定它是脱离实际的。

假說不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經常出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里有时也要运用假說。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里，曾說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由假說变成了由科学方法证明了的原理。他指出，由于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天才的假說，使得人們第一次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使科学的社会学得以出現。他又指出，馬克思在提出这个偉大的科学假說之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的材料，并根据大量材料把商品經济体系的活动規律和发展規律做了极詳尽的研究，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儿点概括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自从《資本論》問世以后，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再是假說，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了。

使用假說的方法，并非让人们毫无根据地去玄想。科学假說的建立必須有一些事实材料作根据，或者它是某一已知原理的推广。成为科学的假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不能和已知为正确的事实或已由大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如果假說和事实不符或和正确的理論相冲突，那末这个假說就不能成立。

在人們所掌握的事实还不够充分，这些事实的可靠性还不够清楚，或对这些事实的細节以及它的准确程度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根据这些有限的事实有时可以抽象出这种或那种假說，因而就表现为多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例如，关于天体演化过程就有好几种不同假說并存。在化学的催化理論上有好几种学說。原子核結構的理論目前就有五种模型之多。在遺傳学方面有两种学說，其一是米丘林的理論，另一种是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古典遺傳学。在几种假說中也許只有一种假說是对的，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相互补充。原子核結構理論虽然有五种之多，但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滿壳层”原子核附近的一些現象，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大变形”原子核。在科学理論研究过程中，有多种假說并存，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几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会通过不断的討論和爭論以及由于新的实验材料的出現而逐步得以澄清。結果或者是以某一种較正确的假說为基础而发展为系統的理论，或者是用“兼收并蓄、融会貫通”的办法形成一种統一的理論，有时是根本地推翻这些假說，另建新的假說。

假說有时以“出人意外”的形式出現，甚至看起来带有若干想像的成分。但是，只要它有一定的事实或理論作根据，不和已知为正确无誤的事实或已由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即使它带有若干假想或猜想的成分，它仍然不失为科学的假說。对于这类假說，我們不应輕易地加以排斥或否定。在科



的关系，必須爭取和確保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以便把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然後不停頓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中國革命的全部實踐證明，正確地處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同正確地解決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實現領導權的問題，是互相不可分離的。在民主革命中正確地解決了這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就能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成為擔負兩個階段革命任務的統一戰綫。

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和斯大林曾經多次論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經脫離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而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根據這個理論，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提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世界十月革命的一部分”和“爭取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命題。這個命題是正確的。但是，如同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時這一命題的理論意義還沒有充分發揮，以致人們還只能模糊地認識這個問題。這個正確的命題曾受到了機會主義的反對或者歪曲。反對這個正確命題的代表、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把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看作舊民主主義革命，認為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階段，因而他們把領導民主革命看作資產階級的事情，把民主革命的勝利看作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派給工人階級以替資產階級充當苦力的角色。陳獨秀主義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用一座萬里長城隔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聯繫，因而從右邊取消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歪曲這個正確命題的代表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他們抹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發展階段論，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因而把整個資產階級以至上层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並且低估農民反封建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結果從“左”邊嚴重地損害了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兩種機會主義都不理解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區別和銜接，因此也都不能解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根據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經脫離舊範疇的理論和中國的歷史特點，反復地闡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革命按其社會經濟的性質，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它的發展和勝利必然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廣闊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前途。這樣，就把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辯證地統一起來，正確地解決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銜接的問題，並在根本上樹立了爭取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毛澤東同志說：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



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②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③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地区别开来，反对主观地超越民主革命阶段；另一方面又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中就尽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这里，主要的就是：第一，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使党成为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坚强的先锋队。第二，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使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同盟军，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三，建设和发展革命武装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根据地实施各项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和奖励对国计民生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一方面尽可能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因素。在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逐步地培养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有管理国家经验的干部。第四，执行彻底的群众路线，放手领导群众自己动手进行革命斗争，从斗争中不断地教育自己，提高觉悟。“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④ 我们党因为贯彻执行了这个根本路线，所以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经验证明，在民主革命中，各种革命力量尤其是工农群众发动得越广泛，越深入，革命就进行得越彻底；而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就使各种民主力量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广泛的团结，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顺利。走这样的道路，就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不但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且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

①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642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65页。

④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4版，第37页。



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① 走这样的道路，就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取得和巩固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引导到彻底胜利，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以武装力量为支柱的统一战线，所以能够成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正因为它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它能够成为担负两个阶段革命任务的统一战线，或者说成为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指出，“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② 在民主革命阶段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是这样。十多年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胜利地经过了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现在，它正在继续团结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胜利地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可以预见，它将继续长期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直到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地消灭阶级。这还有疑问吗？我们认为不应该再有疑问了。

六、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统一战线

我国人民，经过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而且团结起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更好地担负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在共产党内部，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中，在全体干部和一部分同盟者中，就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因而组成了一个政治上一致的、坚强的革命队伍。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和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方法逐步地推广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中去，并且已经收到很大的效果。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空前广泛和空前深刻的革命，不但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而且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根本改造一切剥削者和私有者，教育全体人民。毛泽东同志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5页。

^②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69—1470页。



者也要改造”。^① 只有这个改造工作做好了，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彻底解放全体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启示我们，只有在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把一切都改造过来，只有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分子实行根本改造，同时帮助一切劳动者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消灭阶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的工作，包括改造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分子在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崇高事业。对剥削阶级实行根本改造，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剥削分子化为劳动者，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的经验证明，改变剥削者所有制还比较容易，真正困难的是改造剥削者，这要比所有制的改造艰巨十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实现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依靠一个根本条件，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才能对已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用专政的方法，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同志说：“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② 民主的方法，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方法，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方法。经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广泛地团结各民主阶级的人民，又能够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十多年来，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它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它的各级委员会，对组织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③ 我国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部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进行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实现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同时在改造中国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实现着对自己的改造。我们相信，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部分人民，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页。

③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页。



领导下，继续不断地和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继续不断地和彻底地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就一定能够共同进入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

七、 支持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同时，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胜利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呢？原因在于我们是处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①“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②所以，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历来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力争外援的方针。革命也好、建设也好，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必须首先依靠自己努力奋斗。自己奋斗愈力，就愈能取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就愈能发生积极作用。不以自力更生为主，无疑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重视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不积极争取这种援助，而把自己孤立起来，或者把自己的斗争看成孤军奋斗，同样也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广大人民，从四十年的艰难经历中，对于自力更生为主，是理解得很清楚的，对于力争外援的必要，也理解得很清楚。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切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援助，对于中国革命历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世界的事情已经联成一气，各国革命力量需要互相援助的论断，是一个普遍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更加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的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日益威胁着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互相接近和联合起来。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人民，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所面对着的国内敌人不同，但又都是处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威胁或者包围之中，他们的内部敌人又往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论是争取民族独立或者争取社会主义，不论是争取民主或者争取和平，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尤其要碰到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阻挠。因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56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页。



此，他們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人民，促使他們互相接近和联合起来，逐渐結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統一战綫是如此地广泛，它以社会主义陣营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为核心，包括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包括了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起来包圍世界各国人民，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包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包圍和反包圍的斗争已經遍于全世界。在这个包圍和反包圍的斗争中，东風已經压倒西風，就是說，优势已經在世界人民这一方面。这个优势在今后必然繼續扩大，并且正在繼續扩大。

中国人民的統一战綫，是世界人民的統一战綫的一个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統一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把中国人民的团結和世界人民的团結联系起来。在发展和巩固国内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同时，总是力爭“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結成国际的統一战綫”^①。

一九六〇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正确地指出：“中国的人民革命給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陣地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它給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有力的推动，給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巨大的影响。”^②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自己在世界人民面前和国际統一战綫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将和以往一样，永远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永远巩固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結，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和以往一样，在中国各民族人民中經常地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結合的教育，反对各种各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目前时期，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拼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团結和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团結，破坏各国人民之間的团結。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克服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影响，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們的口号是：‘中国人民大团結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結万岁！’。依靠这两个偉大的团結，我們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③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7頁。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頁。

③ 刘少奇：《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頁。



对目前音乐创作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 吕 骥 ·

近几年来，我国音乐创作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日益繁荣，不断提高。由于作曲者遵循党的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对急剧变化着的工农兵群众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破除了迷信，从一些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因而使我们的音乐创作能够迅速地发展，多方面反映了今天异常丰富的现实生活。

音乐创作的繁荣和提高，使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向我们提出了若干和创作有关的新问题。总结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经验，研究这些新问题，对于推动音乐创作继续向前发展，是有益的。这里仅就音乐创作上几个大家谈论着的问题，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在音乐创作中，题材固然不能成为作曲者在创作上取得成就的决定因素，但在一个时期中，题材的变化，特别是选取革命斗争题材，却反映了作曲者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目前出现许多以革命历史、当前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人物、以及民间传说中的理想人物作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于作曲者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我们深信，随着作曲者对于革命

历史、当前革命斗争和英雄理想人物的认识的加深，艺术表现手法的日益丰富和个人风格的逐渐形成，这类题材的音乐作品，不久一定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虽然选取反映革命斗争和英雄理想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在全部音乐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但我们的作曲者并不以为写了这类作品就可以满足广大群众多方面要求，他们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指导下，努力扩大自己选题的范围，从各方面反映无比广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进一步地发挥了各个作曲者不同的创造才能，有效地显示出不同作曲者的创作个性。

现在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有关以革命历史、当前革命斗争、英雄人物以及民间传说中的理想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中有关音乐创作思想的一些问题。

怎样去写革命斗争和英雄理想人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现有的这些作品中，有的基本上是按照文学著作的主要发展线索作为音乐构成的基本骨架的，像《浣溪沙》交响诗，《保卫延安》交响诗；有的是根据戏曲的基本情节构成音乐章节的，像《穆桂英挂帅》交响诗，《秦香莲》交响诗，《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些作品，在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刻画民间传说中的理想人物方面，都获得



了一定的成就。由于这些同名的文学作品和戏曲的情节已经为许多听众所熟知，这样做比较容易为听众所理解，而作曲者从戏曲和文学著作中更可以找到许多刻划音乐形象的参考，这是这种写法的优点。像《浣溪沙》交响诗的结构，既符合于毛泽东同志原诗的内容，也适合音乐的发展。但是，另外许多作品，如《保卫延安》交响诗，《穆桂英挂帅》交响诗，《秦香莲》交响诗，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来看，就完全可以用不同于文学著作和戏曲结构的构思；这几部作品基本上是按照文学和戏曲的情节来构思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戏剧情节性，却不能说是充分发挥了音乐性能的作品。这些作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音乐和文学、戏曲在表现手法上究竟有无不同的特点？文学戏曲所能做到的，音乐是否也能做到？不用说，大家都会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如文学，特别是小说，擅长于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和生活变化的细致描绘，来展示时代的面貌；戏曲是擅长于通过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来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矛盾；而音乐（指不与诗词相结合的器乐）则适合于通过直接抒写各种情景中人们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现实生活，却不擅长于复杂情节的叙述和事件的描写。它虽然也可以具体描写胜利和失败的情景，却是通过抒写胜利者的欢快情绪和失败者的颓丧情绪而达到的。它虽然也可以表现庄严的意境，寂寞或活跃的情景，也还是通过对处于这种情景中人们的感受和情绪状态的描绘而达到的。虽然音乐也能够具体地描绘某些特定的景色，但是，它是借描写这些特定景色，写出了作家的感受，以及他所想要表达的生活情绪。勉强要它去叙

述生活的具体情节，描写事件的发展，以及某些概念思维，必然要使得音乐艺术失去它所特有的功能。像《保卫延安》、《秦香莲》、《穆桂英挂帅》交响诗这类器乐作品，虽然作者也考虑到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却并没有根本跳出文学和戏曲的范围。试想一下，如果作者按照音乐的特长，在这些作品中突出主题的抒情部分，通过抒情的曲调去描写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塑造人物形象，将某些具有戏剧性的乐段充分展开，使生活内容从另一个角度得到深刻的揭示，删去某些不必要的生活外部形象和过场的描写，这些作品不会更精炼、更富于音乐效果吗？人物的形象不是会更加鲜明吗？

应该看到，音乐有它不同于其他文艺形式的特点，音乐构成有自己的规律。不应当把文学和戏曲的构成规律强加在音乐上。穆桂英、秦香莲这类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完全可以作为音乐题材，但应该按照音乐构成的规律去塑造他们的形象，不能完全借用戏曲的布局，更不能完全局限在戏曲的唱腔和曲调的范围中。只有按照音乐塑造形象的特殊手法加以丰富和发展，才能达到典型的高度，获得最大的音乐效果。就是这样，也还要承认音乐艺术的局限性，比如在器乐作品中，不用文字来说明，“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个主题是借自戏曲中的一句唱腔，就很难描写“我不挂帅谁挂帅”的思想。离开了文字说明就无法理解、无法听懂器乐曲，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最有前途的音乐。

此外，我们也看到一些以当前人民斗争和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器乐曲，是以流行的群众歌曲和民间音乐作为素材而创作的。如《抗日战争》交响乐就是选用当时的群众歌曲作



为塑造生活形象的素材。这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作曲者所写的音乐很容易唤起广大听众曾经亲身经历过的生活回忆，《抗日战争》交响乐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作者所选用的歌曲不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也不都是很好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的。这种方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在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创作中都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问题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能否完全采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否说是唯一的方法，在概括生活、塑造形象上是否也有它的局限性。有的作者对当时的这些群众歌曲并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没有选用那些最典型的歌曲，也没有根据这些歌曲音调加以提炼、发展，创造出概括了现实生活的音乐形象，因此这种借用只是成为一种省事的方法。显然，如果只是简单地、千篇一律地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作为表现革命军队的形象，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曲调去表现人民解放军的形象，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调去表现人民志愿军的形象，而不根据作曲者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分析，创造出足以概括现实生活中各种形象的典型的音调，作为自己的音乐基础的话，那就只能导致音乐形象日益贫乏，也必然要导致音乐语言的日趋单调。这显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创造性地采用这种方法。

上面谈到的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在一些以革命历史、当前的群众革命斗争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音乐作品中所常遇到的问题。这是属于音乐创作思想和创作技巧方面的问题，也是要影响到创作质量的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我们作曲者不能克服认识上的和技

巧上的局限性，不能很好解决这两个问题，就会阻碍音乐创作水平的提高。

二

音乐艺术上任何一种重大的变化，都反映了作曲者思想观点的变化。题材的变化是这样，音乐艺术的日益民族化也是这样。音乐艺术上的民族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这里我们且不去研究音乐表演上的民族化方面的问题。音乐创作上的民族化也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也不打算展开全面的研究，这里只就音乐语言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因为音乐语言在音乐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音乐语言民族特点的鲜明程度会影响到一个作品的民族风格的鲜明程度，音乐语言的丰富与否和作品的丰富性常是相关联的，音乐语言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其他方面的变化。

近几年来，音乐语言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这是由于作曲者普遍地认识到音乐艺术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就必须为工农兵群众所理解；要为工农兵群众理解，就必须做到音乐语言具有民族风格。基于这种认识，作曲者学习了民间音乐。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努力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成效的。今天从音乐创作上所看到的音乐语言的日益民族化，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现在音乐创作中表明，作曲者在学习民族音乐语言和创造新的民族音乐语言方面，遇到一些新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仍然是如何批判地继承民族音乐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音乐的问题。

我们已经听到许多改编的优秀民歌（包括各民族的），根据民间音乐写成的民族器乐



曲，在民間音乐基础上創作的交响音乐，以及那些受民間音乐影响很深的大合唱和各种形式的歌曲，这許多作品和民族音乐語言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广大听众对于这些音乐是欢迎的。我們对于作曲者的这种努力和他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应当加以肯定的；但是如果看不到現有工作的局限性，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也是不对的，那样就不能繼續推动工作前进。我們认为應該肯定在民歌和民間音乐基础上进行加工創造，这是学习民族音乐遗产的一种必要的工作。貝多芬就曾經为許多国家的民歌写过伴奏，也用民歌作主题写过一些不同形式的作品。許多古典作曲家和現代作曲家，都在这些方面作过許多工作。这样的工作，可以帮助我們进一步理解民族音乐的特点、发展民間音乐和在民間音乐基础上的創造的可能性。但是这只是工作的一个方面。我們还必须根据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經驗，进一步去創造。我国杰出的音乐家聶耳、冼星海、張曙在这方面是我們学习的典范，他們正是从民族音乐遗产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而能够創作出許多既具有革命內容，又具有新穎的民族風格的优秀作品。但現在有些作曲者却不是这样。他們的創作或者拘泥于原来的民間音乐，原封不动，不敢作任何新的发展，或者只是因襲原来民間音乐的音調，沒有增添任何新的內容，因此，使人觉得依然是旧調重彈。这样的創作是不能滿足广大群众日益提高的要求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脫离了群众。这是以保守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音乐傳統。事实证明，这样的音乐并不能表現这个时代的人民精神，这样的音乐在表演的当时，群众虽然也欢迎，可是不要很久，群众也就忘記了，因

为在音乐上沒有給他們什么新的东西。

从这里可以看到，如何創作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是我們音乐創作上的一个新的課題。过去我們有些作曲者深受民族音乐虛无主义观点的影响，脫离了民族音乐傳統去創造新的音乐語言，这样当然是要失败的，因为他們的立脚点錯了。有些深受資产階級唯美主义思想影响的作曲者，脫离人民生活去創造新的音乐語言，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他們完全失去了音乐創作的生产基地。事实证明，以虛无主义观点对待民族音乐傳統，是不可能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的。而以保守主义的观点对待民族音乐傳統，也难以創造出真正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許多成功的作品表明，音乐語言的創造，必須从群众生活中去寻找根据。因此，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作为指导，从人民生活出发，批判地学习民族音乐遗产，是創造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音乐語言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还有一个問題值得提出来討論。有些同志把音乐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風格并列，并且把地方特点和民族風格等同起来，甚至认为沒有本地特点就是沒有民族風格，并且狹隘地排斥所有不具有本地特点的音乐。有些強調本地特点的人，事实上只承认一个狭小地区的民間音乐作为一个省区的地方風格的典范。这样，不仅縮小了这个省区的音乐特点，同时也把音乐的民族風格理解得过于狹窄了。当然，民族風格可能具有某一个地方音乐的特点，但不能反过來說，沒有某地音乐特点就不具有民族風格。比如《义勇軍进行曲》、《大路歌》、《打长江》、《黄河大合唱》等許多具有民族風格的声乐作品，誰能說它



們只是具有某一省的民間音樂特點呢？不用說，鼓勵作曲者深入地研究地方音樂，作為創造新的民族音樂風格的具體基礎，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地方風格和民族風格並提，甚至於把地方風格強調到超過民族風格，這對於繁榮音樂創作也是不利的。必須特別說明，這裡完全不是反對我國五十幾個兄弟民族的音樂不應該具有自己的民族特點。各民族完全应当發展自己的特點。這裡所反對的只是在漢民族內部不適當地強調某一地區音樂的地方特點，把它作為我國音樂民族風格的標尺的觀點。否定音樂上的地方個性是錯誤的，借抽象的民族風格以逃避對地方音樂進行深入研究，更是錯誤的。但只承認個別地方特點，而不承認在別的地方音樂的基礎上、或者在較為廣泛的基礎上而創造的民族風格也是不對的。那樣只能導致音樂語言的單調。

在學習民族音樂遺產方面，應該說目前面還不夠廣。建國十多年來，大家接觸比較多的還是民間音樂和幾個兄弟民族的音樂。而對唐宋流傳下來的大量古典音樂遺產，如六百多首七絃琴曲，四千多首詞曲音樂，等等，我們還未曾進行過全面的探索；對於五十幾個兄弟民族的豐富的音樂遺產，也還未曾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整理，大家也就無法展開深入的研究。學習民族音樂遺產，從民間音樂入手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活著的民族音樂遺產，正是民間音樂。它的豐富的人民性，風格的多样性，都容易為大家看到，內容和當前人民生活更為接近，而且各地都有許多優秀的民間藝人，學習起來比較方便。但是不能把我們的學習範圍局限在這一方面。在古典音樂遺產中，雖然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

性的精華同時並存，但經過科學研究，批判其消極的部分，繼承並且發揚其民主性的精華，對豐富與發展新的音樂語言是有積極意義的。歷年來在發掘整理七絃琴音樂工作中，以及最近開始着手研究《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的工作中，已經使我們看出，這些古典音樂遺產蘊藏著古代人民光輝的創造。我們有什麼理由把這份寶貴的音樂遺產置之不顧呢？我們必須把繼承音樂遺產的面放寬，把古典音樂和各兄弟民族音樂遺產包括進來。這樣，我們在音樂遺產中就能夠吸收豐富的營養，創造出更富於感染力、更富於色彩的、個性鮮明的音樂語言。當然，批判地學習外國音樂語言也是不可少的。只要根據生活的需要，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對我們總是有益的。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①而且告訴我們，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取我們所需要的成分，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澤東同志在這裡談的虽然是學習一般語言的問題，可是對我們學習音樂語言，也是有指導意義的。

三

音樂形象，這是一個借用詞。音樂是聲音的藝術，不可能有形象。所謂音樂形象，是指某種情緒鮮明的音樂，由於準確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因而在聽眾頭腦中喚起某種生活形象的感覺。為了塑造出特定的音樂形象，首先要求作曲者對於這個特定形象的性格，它的社會意義以及它的音調特點，都有深刻的認識。只有經過充分的醞釀，真正達到了胸

^① 《反對黨八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8頁。



有成竹的时候，作曲者才能运用他的音乐写作技巧精心雕塑。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在听众的感觉中引起某种特定形象的感受。

近几年来一些成功的作品，为我们塑造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形象，留给人们以鲜明的印象。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没有留给听众任何印象。分析起来，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作曲者对所选定的题材和所反映的现实，缺乏明确的认识。当然，也有的作品，的确是由于创作得过于匆忙，作曲者对于形象的探索，缺乏充分的酝酿，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对于所塑造的形象进行精雕细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曲者把音乐形象的塑造，看作仅仅是技术性的工作，因而忽视了音乐形象的生活思想内容，这样，他所创造的音乐虽然不能说没有形象，可是他所创造的形象和听众在生活中所感受的形象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使听众觉得这个作品缺乏生活的真实性。比如钢琴曲《双飞蝴蝶》，我们不能说这个作品缺乏形象性，但却有许多人觉得它的形象缺乏生活的真实性。这可能是由于作曲者不是从生活思想内容出发去进行音乐创作，没有把反映一定的生活思想感情作为音乐创作的任务，因而不要求自己的创作真实地反映生活，自然也不严格地要求自己所塑造的形象是否符合于生活的真实。结果，音乐创作变成了技术性的游戏。这显然不是作曲者所期望的。

此外，也还有另外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作曲者在塑造英雄形象的时候，常常不是在作品中把他的英雄作为一个阶级集中的代表，最高的典型，反而在思想上把他平庸化了，因此，尽管作曲者把主要曲调写在高音区，全部乐队都用上，再加上四五个

强音记号，听众仍然觉得黯然无光。像这样的音乐，我们不能仅从技术方面去寻找作品的缺点。缺点的根源在于作曲者的思想认识上，在于作曲者对现实生活，对英雄人物缺乏分析，没有提到思想性的高度来认识，对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缺乏深刻理解。因此在音乐创作中，不敢放手把他的英雄塑造得更崇高些，更伟大些，更美些。现实生活在这样的作品中失去了丰富的色彩，英雄人物被简单化了，作品的形象也失去了生活中的多样性，矛盾和斗争失去了它们在生活中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只要拿像《赵氏孤儿》、《打龙袍》、《四进士》这类古典戏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和我们今天的某些音乐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对照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某些作曲者在音乐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尽管在思想本质上远不是古代英雄人物所能比拟的，但在艺术形象上，却不如古典戏曲中的英雄形象那么生动、富有艺术的感染力。分析起来，原因很多，但主要的还是由于作曲者对他所描绘的英雄人物和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缺乏深入的分析，作曲者自己的思想水平还没有达到完成他的艺术创造所要求的高度。虽然有些音乐作品的作者还有另外一些缺点，比如音乐语言贫乏、写作技巧（包括和声配器等）修养不深，但是，最根本的认识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即使其他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中心问题——英雄形象——典型的塑造仍然得不到最后的解决。我们只有完满地解决了音乐创作中形象塑造这个难题，使塑造的音乐形象具有生活的真实感，才有可能创造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音乐作品。我们相信，作曲家们在不断的实践中，一定能够经过努力来解决这个难题。



“做笨事”

聞 師 潤

钻研学问，就认真地学习，学了不会，再学，还不会，又再三再四地学，不是不懂装懂，也从来不偷懒取巧。这种人做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些“呆板”，不大

“灵活”。因此，把它叫作“做笨事”。

有人认为，这样“做笨事”，花的力气最多，进度最慢，最不合算。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凡是这种肯“做笨事”的人，他们的事情总是办得比较牢靠，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工作质量比较好。所以，比起那些不愿下苦功夫的人，为贪便宜，图省事，结果走了弯路，不得不重新补课来说，还是最省力、最合算的。这样，看起来似乎慢，实际上却是快，看起来好像“笨”，实际上并不笨。

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有巧干。但问题是如何做到巧。这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巧看做是创造性的劳动，是需要通过辛勤锻炼才能产生的。所以任何巧事都要从“笨事”做起。不愿做“笨事”，不愿下“笨功夫”的人，就不能做到巧。艺术上的灵巧熟练，首先要从基本功练起，按照严格的规矩和程序把功夫练到家。这就是一件“笨事”。但是，只有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实实在在地打好了根底，认真地掌握了这些基本动作的规律之后，才能得心应手，做到熟能生巧。科学技术中的许多创造发明，同样也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以至更多的试验，经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才能获得成功。没有百折不挠的科学实践，根本不可能有创造发明。由此可见，实干是一切巧干的基础。人们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在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充分

要做好任何一件工作，或者要掌握任何一种本领，必须有认真的态度，踏踏实实地下功夫，才能收到效果，达到目的。事业上的成就，工作中的成绩，总是人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勤劳苦干的結果。世界上从来没有不花力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工作做出贡献，或者不经过艰苦的锻炼就能够真正学会本领的事情。

著名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谈到练功时，有过一个比喻。他说：初学练功，大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一教就懂就会，会了就往旁边一摆，睡觉去了。这种人学“会”比谁都快，但比谁都懂得少，忘得多。另一种人是师傅教他时，不懂就捉摸，问它十七八个为什么。这种人，学“会”虽然比较迟缓，可是会了之后，懂得最深，忘得最少。有人把前一种人称为“伶俐鸟”，后一种人称为“笨鸟”。“笨鸟”有个笨办法，那就是别人安寝了，“笨鸟”还在踢腿，别人睡梦正浓，“笨鸟”已经起床，正在翻旋子，下腰。结果：“伶俐鸟”虽然聪明又伶俐，但一无所得，而“笨鸟”却学到了许多本领。

在实际生活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一种人，无论说话、做事，总是要求有根有据，说到那里做到那里，从来不说瞎话。做起事来有板有眼，有头有尾，一步一个窝，非常扎实。不论是执行重大任务，还是做小事情，总是认真去做，不肯马虎。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讲究技巧，讲究方法。反复地学习，反复地研究，反复地试验，反复地向群众请教，有了这种务实精神，才能为巧干提供动力和前提。

另一种看法，却是把图省力，贪方便，走“捷径”，当成是一种“巧”办法。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巧，而是一种蹈虚取巧。就像“伶俐鸟”的练功，学了一些皮毛，就不再去进行刻苦的锻炼，结果一无所得。同样地，如果以为用不着掌握科学的基本知识，就可以攀登科学顶峰，用不着认真研究前人的成果，就可以批判地继承遗产，用不着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满足于一般号召，就可以完成工作任务，这也一定是要落空的。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地去做，不可有贪图侥幸成功的心理。他说：“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①他又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灰尘不经过打扫，是不会自动去掉的；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这正是说，不经过耐心的切实的工作，不付出辛勤的劳动，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功。灰尘是需要一寸一寸去扫的，工作是需要一件一件去做的，艺术高峰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攀登的，科学堡垒是需要一座一座去夺取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功夫没有做到，或者做得不牢靠，任何预期的目的也达不到。

正确的方针和原则，是我们工作的向导。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人们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的情况，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试验，然后才能规定出来

的。而且有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还远不是事情已经办好。要实现原则和方针，还必须切切实实地做许多具体的工作。拿我们过去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了的土地改革这件大事来说。长期的斗争经验使我们有了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有了关于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各项政策，这是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正确向导。党和人民政府向农民群众发出了土地改革的号召，并且派出了工作队深入到一个一个的乡村中去。这些工作队在所到的每一个村子中，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耐心地启发群众的觉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发动群众，并且把党的政策详细地交代给群众。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群众自己动手，一户一户地划分阶级，把恶霸地主一个一个地斗倒，并且解决了在平分土地中所遇到的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土地改革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中又包含着极其细致和复杂的工作。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地下“笨功夫”，才能真正达到土地改革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抛弃了这一套正确的办法而另求“捷径”，采取简单地从上而下“恩赐”的办法，那就既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把土地改革工作做好。

总之，我们做事情，要不怕困难，不嫌麻烦，不贪便宜，不图轻便；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如果有人看不起这种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认为这是“做笨事”，那么我们要说，我们所要提倡的，就是这种“做笨事”的工作态度。

^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9页。



西德壟断資本和它的向外扩张

· 严 希 ·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紀末叶才完成自己的資本主义工业化，但到二十世紀初叶便成为“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鮮、更强大、更有組織、更高明”^①的帝国主义。当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时候，世界殖民地的大部分已被英、法等帝国主义大国所瓜分，直到一九一四年，德国搶占到的殖民地的面积，只有法国的四分之一强，不及英国的十分之一。强烈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德国帝国主义，一九一四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以失敗告終。一九三九年德国帝国主义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招致了更加惨重的失敗。德国帝国主义丧失了全部国外市場和投資。德国东部已經脫离了資本主义体系，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德統治的地盘只相当于战前（一九三七年）德国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帝国主义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自己的經濟力量。西德的工业生产一九四六年只及一九三六年（西德地区，下同）的百分之三十四，到一九五〇年就超过了一九三六年的水平，一九六〇年則达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二百七十六。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十年期間，西德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五强。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除日本以

外，战后以西德的工业增长速度为最快。目前西德的整个工业生产虽然还没有赶上英国，但在若干重工业产品方面却已遥遥領先。一九六〇年，西德鋼产量达到三千四百一十万吨，汽車产量二百零五万四千辆；英国鋼产量为二千四百七十万吨，汽車产量一百八十八万八千辆。

随着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西德資本的集中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战前一九三八年，德国股票資本总額为一百八十七亿四千四百八十万馬克，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集中于十九个大壟断集团。一九六〇年五月，西德股票資本总額上升为二百八十八亿二千五百一十萬馬克，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十七个大壟断集团所掌握。目前，在西德全部企业家数中占百分之零点四的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占全部銷售額的百分之六十。据一九五八年統計，克虏伯、蒂森等十家康采恩控制着西德鋼铁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九十四，铁矿开采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硬煤开采量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門子康采恩控制着电气工业銷售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法本康采恩控制着化学工业銷售額的将近一半。五个石油康采恩控制了石油生产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3頁。



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三。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西德的对
外貿易总額从一百九十八亿馬克，增为九百
零六亿馬克，增加了三点五倍；其中出口貿易
的增长特別迅速，增加了四点七倍。在資
本主义世界出口貿易中，西德的比重已經于
一九五九年超过英国而居于第二位。以整个
資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額为一百，美、英、西德
三国的比重如下^①：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估計数)
美国	20.7	21.0	18.9	17.4	18.5
英国	9.7	9.5	9.5	9.3	9.0
西德	8.0	8.7	9.4	9.7	10.3

在資本主义世界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中，
西德超过英国的情况更为明显^②：

	1955	1958	1959
美国	24.5	23.3	21.3
英国	19.7	17.9	17.3
西德	15.4	18.5	19.1

西德的对外貿易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連年
出超，从而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外汇儲备。到
一九六〇年年底为止，西德黄金外汇儲备已
达三百二十亿馬克（約合七十六亿美元），在
資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大量的黄金外
汇儲备，为西德进行資本輸出提供了有利条
件。西德从一九五二年大規模进行資本輸出
以来，国家資本輸出达九十亿馬克以上，私
人資本輸出达一百九十亿馬克以上。

西德帝国主义經濟力量的迅速恢复和发
展，是和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扶植分不开的。扶
植西德，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
策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一九四六年杜勒斯
就說过：“德国（西德）以它的各种条件而言，

是除原子彈以外的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这
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手的”^③。在美帝国主义的
心目中，西德不仅在战略上占有特殊重要
地位，而且是美国壟断資本擴張經濟势力的
重要工具。美国扶植西德壟断資本，可以在
西德攫取巨大的利潤，并且通过西德而更方
便地打入西欧和某些不发达国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就竭力
避免破坏西德的工矿企业。根据美国自己的
調查，西德工业中心魯尔区因美国“战略轰
炸”而損失的煤矿生产能力，只占全部煤矿
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鋼铁生产能力的損失
也只有百分之五。与此相反，魯尔区所在的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工人住宅，却有百
分之六十八点四被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
美国无理拒絕了苏联关于由苏、美、英、法
四国管制魯尔区的建議，并从一开始就阻撓
对西德企业进行拆卸。一九四六年美、英、
法三国協議拆卸西德企业的項目为一千七百
四十項，后經几度削減，到一九四九年拆卸
項目减少为七百三十九項，事实上就連这七
百三十九項也未如数拆除。根据某些英国資
产階級經濟学家估計，尽管經過战争破坏和
战后拆卸，一九四九年西德工业生产能力仍
然等于一九三六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至一百
二十五。战后初期，美、英、法占领当局在
世界人民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經实行过所謂
“非卡特尔化”，以“分散”西德的壟断組織，但
这是一种遮人耳目的手段，被“分散”的企业

① 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61年3月号。

② 英国《經濟学家》杂志，1960年4月30日。

③ 轉引自海因尼格：《西德战后的經濟周期1945—
1950》，德文版，第91頁。



只是形式上成为独立的企业，实际上仍归原来的康采恩所有。一九五六年西德联邦议院通过“工、商、矿业改组法”之后，这种形式上的限制也已取消，被“分散”的企业都纷纷正式宣布重新归并入原来的康采恩。此外，美国占领当局还对费德门格斯等纳粹银行巨头宣判无罪，并提前释放了克虏伯等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战后初期，美国向西德输出了大规模的国家资本，对西德垄断资本起了“输血”作用。根据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数字，从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起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美国给予西德的政府补助金和信用贷款，共达三十八亿六千八百万美元，其中从战争结束起到一九五一年为止，就给了三十四亿美元。在这些补助金和信用贷款中，对西德经济恢复起作用最大的是“马歇尔计划”的贷款。

“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的贷款共为十五亿三千万美元(约合七十一亿五千万马克)，这同战后西德整个投资相比虽然为数不大，但由于计划执行的第一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就支付了贷款的百分之四十，帮助西德垄断资本解决了大规模恢复生产时期极端缺乏外汇的困难。同时，“马歇尔计划”所设立的“马克对等基金”，也给西德的企业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周转资金。“对等基金”是用西德厂商偿付“马歇尔计划”的贷款的马克构成的，西德政府在美国有关部门的同意之下，把这笔款项用短期信贷的方式投入急需资金的部门，然后收回贷款和利息再投入另一部门，如此循环反复，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利用这项基金进行的投资已达一百亿马克。这项“对等基金”几乎资助了西德的一切经济部门。

西德垄断财团的代表艾哈德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是西德“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①

随着美国国家资本的大量投入西德，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也大量渗入。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美国在西德的私人直接投资由二亿零四百万美元增加为七亿九千五百万美元，增加将近三倍。美国私人资本分布在将近五百家西德企业之中，遍及一切部门，特别集中在石油、汽车和电气三个部门。在石油工业方面，美国垄断资本的投资最多，达二亿零一百万美元。美国洛克菲勒集团开设的“艾索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就控制了西德石油生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汽车工业方面，西德四大汽车公司中的奥培尔和福特两家公司分别属于美国的杜邦集团和福特集团。这两家公司的小汽车产量约占西德小汽车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卡车产量占百分之十七。在电气工业方面，摩根集团的通用电气公司占有西德通用电气公司的多数股票，美国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控制着西德的罗侖茨公司；梅隆集团的威斯汀豪斯公司在西门子康采恩中也拥有投资，双方并在日内瓦联合开设了一个企业。

美国垄断资本通过缔结合作协定同西德垄断资本密切勾结。一种是技术合作协定和专利权协定。美国垄断集团把自己的专利权出让给西德，作为投资，牟取利润，而西德垄断集团则由此获得某些自己还不能掌握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例如，美国轧钢公司对西德蒂森康采恩钢铁企业的改建提供了技术

① 艾哈德：《德国重返世界市场》，德文版，第92页。



援助,并同曼纳斯曼康采恩、克虏伯康采恩和德馬格机器制造公司签订了专利权协定。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同西門子康采恩签订了交换原子情报的协定等等。另一种是关于瓜分市場的协定。例如,美国馬林克罗德化学公司同德占薩公司签订了后者可以在英国以外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經售前者产品的协定。

近年来,美国壟断集团又以各种方式把資金和技术投入西德的軍火生产。美国在这方面渗透的方式,有以下四种:一、出卖专利权。如西德麦塞施米特公司和海因克尔公司获得了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星”式飞机的仿制权;巴伐利亚汽車公司則向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星”式飞机发动机的仿制权。过去两年,美国壟断集团从西德企业获得的专利費达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軍火专利費。二、购买西德企业的股票。如美国联合飞机公司购买了克虏伯康采恩的威悉尔飞机公司的百分之四十三的股票。三、在西德設立分公司。如美国佩金斯—厄墨尔公司在西德設立了一家由西德資本参加的子公司,生产該公司的“响尾蛇”导彈;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在西德設有子公司从事导彈电子技术和原子技术的工作。四、美国和西德企业共同制造軍火。如美国凡尔托公司与西德多尼尔公司联合設計和制造“飞行起重机”式直升飞机;制造遙控武器和飞机的美国馬丁公司則同西德特勒丰肯公司、海因克尔公司及麦塞施米特公司合作。

美帝国主义执行分裂德国的政策,保存了壟断資本在西德的反动統治。战后美国从一开始就蓄意破坏波茨坦协定关于重新統一德国的規定,首先在一九四七年合并了美、

英两国的占領区,接着在一九四八年片面实行了货币改革,彻底割断了东西德之間經濟上的有机联系,到一九四九年又成立了分裂德国統一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壟断資本的波恩政府。在这以前,美国保留了希特勒德国在各州的国家机器,西方占領当局在所謂“非納粹化”名义下进行的活动,不是肅清法西斯,而是替納粹骨干开脫罪責,并保留他們的职务。以阿登納为首的波恩政府,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阿登納政府的許多部长,过去在希特勒的国家机关里担任过重要的职务。

美国对西德的經濟和政治上的扶植,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軍事占領,决定了西德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的地位。美国耶魯大学教授多以奇和密歇根大学副教授艾丁格在合著的《德国重新加入大国之列》一书中承认,西德的“外交决策是完全意識到这个事实的(指美国对西德的扶植)……因此,在德国(西德)外交政策的每一重大决定之中,美国政府都是无形的——有时也不完全是无形的——伙伴。”^①西德的复仇主义叫囂和备战活动,都是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慫恿的。美国力图利用西德作为它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工具,但是,西德也并不是单纯处于被动地位。西德追随美国,也是企图通过美国的計劃来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西德帝国主义并不甘心永远依附于美国。战后初期阿登納就說过:“应该这样开始,現在让外国代表坐到德国(西德)企业的监事会里来,然后有一天再让德国工业家坐到西方国家企业的监事会

^① 多以奇、艾丁格:《德国重新加入大国之列》,英文版,第153頁。



里去。”^①一九四九年九月波恩政府成立的时候，他更明确宣布西德要争取“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的地位”^②，要“与西方三国占领当局同心协力，一步一步地争取我们的更多自由，更多权限”^③。目前西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仍然要受美国的控制，但是，近年来西德对于美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唯命是从了。例如，西德要求美国对于重大问题要与“盟国”磋商，不要“发号施令”。西德不仅对美国在西欧的核武器的使用要求有共同决定权，而且还要求自己拥有核武器。对于美国要求西德出钱解救美元危机，西德也没有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美国和西德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

由于美国的“输血”，西德在经济上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现在，在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斗争中，西德不仅是英、法的劲敌，而且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西德帝国主义参加资本主义市场的争夺，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

西德首先夺取的阵地是西欧市场。美国战后推行的以西德为核心的西欧“整体化”政策，为西德向西欧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一九四九年，西德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打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西德由于工人劳动强度高、工资低、战后实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因而在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争中居于有利的地位。一九五〇年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大力从事军火生产，当时尚未大规模生产军火的西德，抓住时机展开民用产品的出口攻

势，加强了自己西欧的地位。西德对西欧的出口，一九五二年超过了英国，一九五八年又超过了美国而成为最大的输出国。一九五九年，西德在这一地区的出口达五十八亿八千万美元，法国为二十四亿五千六百三十万美元，英国为三十亿零八千万美元，美国也只有四十三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在对西欧的贸易中，西德赢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为止，西欧各国对西德的贸易欠款仍有二十九亿九千六百万马克。其中英、法两国就欠十九亿一千一百万马克。西德对西欧国家的资本输出也在急速增长。西德对欧洲货币协定国家的长期投资（每年新投入数），一九五六年为三亿五千七百万马克，一九五七年为四亿五千二百万马克，一九五八年为十四亿五千万马克，一九五九年则高达二十四亿七千八百万马克。

一九五八年，西德同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组成了西欧“共同市场”，这标志着西德向西欧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德是六国之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一九六〇年西德钢产量占六国钢产量总和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小汽车产量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它企图凭借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优势，通过“共同市场”的安排，逐步取得西欧大陆的经济霸权。“共同市场”条约关于逐步取消缔约国内部关税和建立共同对外关税税率，关于逐步取消彼此之间进口定额和关于六国内部实行资金和劳动力自由流通的

① 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版，第211页。

②③ 魏玛尔：《西德联邦总理阿德诺》，高雄版，第250、258页。



規定，为西德向其他五国进行經濟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九六〇年上半年，西德对“共同市場”的出口达到六国内部貿易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三(按月平均值計算)。西欧大陆的資本貨物有百分之六十是西德供应的。西德还向“共同市場”实行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在“欧洲投資銀行”的十亿美元資本之中，西德承担了三亿美元。西德在“共同市場”国家的长期投資(每年新投入数)，一九五八年为五亿五千三百万馬克，一九五九年为十二亿四千三百万馬克，其中西德壟断資本购买其他五国企业股票的数目，一九五八年是一亿二千六百万馬克，一九五九年則达九亿五千一百万馬克，一年之間增加了六倍半。

法国是西德壟断資本在“共同市場”内部进行經濟渗透的主要对象。西德壟断資本不仅对法国本国进行渗透，而且企图通过同法国壟断資本的勾結进一步打入非洲。几年来，西德壟断資本已大量滲入法国的一些企业，如曼納斯曼康采恩掌握了法国薩尔鋼管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資本。克虜伯康采恩通过它在瑞士的子公司在法国两家五金公司拥有投資。弗利克康采恩拥有法国納夫—曼松—夏蒂容鋼材公司百分之三十五的資本，并在法国麦古利投資公司中拥有投資。蒂森康采恩参加了修建馬賽—斯特拉斯堡油管工程，并占有利比亚石油联合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資本。霍希康采恩在法国独资開設了一家鍛造品制造公司。汉尼尔康采恩通过它的子公司德意志石油公司分別在法国的地中海油管公司和南欧油管公司中拥有投資。郎德康采恩在撒哈拉的四处石油钻探工程中拥有百分之

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二点五的資本。德意志銀行則掌握了法国欧洲工业开发銀行百分之五十的資本。

法国壟断資本加紧同西德壟断資本勾結，指望借助西德的經濟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尤其想通过“共同市場”来实现所謂“欧非共同体”的幻想。但另一方面，法国壟断資本对西德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又怀有极大的戒心。在协商“共同市場”計劃的过程中，法国同西德曾展开过勾心斗角的斗争。“共同市場”条約包含許多有利于法国的保留条款，在条約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又采取了某些保护本国貿易的措施。对西德保护本国农产品的关税政策，法国也表示极为不满。同时，法国和西德都力图把“共同市場”变成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政治工具，两国在爭夺政治霸权上的斗争也在不断尖銳化。

英国在历史上同德国是老对头。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都同英德两国矛盾的激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后西德和英国在西欧市場上的斗争十分剧烈，西德在西欧的扩张，大大排挤了英国的势力。在西欧各国的进口总值中，西德的比重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一·三上升为一九六〇年(前三季度)的百分之二十四·四，同期英国的比重則从百分之二十下降为百分之十一·七。“共同市場”的存在和发展，对英国越来越不利。“共同市場”是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广大市場，对英国利害关系很大。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〇年，英国对“共同市場”出口的增长額，比对英联邦的出口增长額要快得多，西德市場对英国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增加。但是由于“共同市場”六国加速降低内部关税和调整对



外关税，结果将使英国商品进入这一市场的困难越来越多。例如，英国小汽车输入西德，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关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三，但在今年“共同市场”第一次调整统一对外关税后，税率就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九，以后还要逐步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九。而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小汽车输入西德，现在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九，将来关税还要全部取消。“共同市场”国家的政治“合作”，特别是（西）德法轴心的形成，对英国利用德法矛盾玩弄欧洲“均势”，以保持英国在西欧领导地位的傳統政策，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为了同“共同市场”对抗，英国纠集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和葡萄牙，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组成了西欧七国的“小自由贸易区”。七国也达成了逐步取消内部关税的协定，这将使西德在这一地区同英国的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英国企图通过“小自由贸易区”来保持自己在西欧的地位，同时以此迫使“共同市场”特别是迫使西德作出某些有利于英国的让步。西德同英国的竞争，就这样发展成为西欧两个经济集团之间的斗争。

西德在西欧同英法争夺经济和政治霸权的同时，越来越积极地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扩张。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西德同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三倍以上，其中出口增长了五倍半，以出口信贷为主的资本输出，仅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便达到一百一十二亿马克以上。

拉丁美洲是西德战后最先进行扩张的地区之一，因为这一地区不仅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傳統市场，而且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后

院”，西德垄断资本认为这里“风险”较少。早在一九五三年，西德就在这个市场上把英国排挤到后边，而占据了第二位。西德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一九四八年还只有三百九十万美元，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七亿三千九百五十万美元，一九六〇年头七个月就已达到四亿三千七百二十万美元。西德同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协定。一九五八年，西德对拉丁美洲的资本输出达到拉丁美洲全部外国资本的百分之十七左右。西德在这一地区扩张的重点是巴西。一九五九年西德对巴西的出口达一亿四千万美元，占巴西进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到一九六〇年九月为止，西德在巴西的私人直接投资达五亿三千一百四十万马克，是西德私人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西德许多康采恩在巴西设有子公司，其总数达二十七家之多。中东也是西德扩张的重点。西德对中东的出口一九四八年只有二百六十万美元，一九五九年已上升为四亿二千八百九十万美元。一九五八年中东非英镑区各国的进口总额中，西德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三点七，超过了英法，仅次于美国（百分之十五点八）。而在阿联和伊朗的进口中，西德已经居于第一位。对于东南亚地区，西德在近年来才加紧进行扩张。在这一地区，西德的扩张重点是印度。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西德对印度的出口增加了十四倍。西德在印度进口中的比重，已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一一点四上升为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二，而同期英国的比重却没有变化。到一九六〇年底为止，西德给予印度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已达十三亿四千六百万马克，同英国（十四亿三千九百万马克）相差不多。



非洲是西德帝国主义久已垂涎的地区，但西德壟断資本的經濟势力滲入非洲，目前还是处在开始阶段。

西德帝国主义积极向不发达国家进行擴張，侵入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这就不能不加深它同英、法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也使西德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趋于表面化和尖銳化。西德在資本輸出方面近年来力图摆脱国际壟断組織的控制，自己单干一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德联邦議院議長格斯登迈尔公开宣称，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具有外交政策的职能”，因此，“无论如何双边援助要优先于多边援助”。到一九五九年为止，西德資本輸出的主要途徑，是通过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銀行、国际投資公司和国际貨幣基金等組織。西德不仅大量承担这些組織的基金份額，給予貸款，而且对不发达国家的信貸，也大多是通过它們进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西德經濟实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新殖民主义的面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識破，为了更狡猾地欺騙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西德在繼續利用国际組織进行“多边援助”的同时，已經以更大的力量直接进行所謂“双边援助”。一九六〇年二月八日的西德《世界报》写道：“在非洲和亚洲，联邦共和国今天也許是西方最重要的国家。英国已經由于苏伊士、法国則由于阿尔及利亚而声名狼籍。美国虽然热心和具有善意，但行动却往往不很成功。（西）德国沒有殖民地，而联邦共和国是富有的。这是一个机会，同时也是一項要解决的任务。”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西德政府和壟断集团筹集了五十亿馬克作为今明两年“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基金。美国要求在“共同的基

础”上管理这笔基金，企图控制西德的擴張，并利用西德的資金来替自己服务。但西德却决定只将其中的七亿五千万馬克交由国际机构运用，而四十二亿五千万馬克完全由西德自己支配。波恩政府外交部和經濟部等部門已为此組成联合委员会，总管其事。战后初期西德为了接受和經管“馬歇尔計劃”的“援助”而設立的复兴信貸局，現在則轉而具体掌握西德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基金。

西德为了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搶夺銷售市場和投資場所，在向不发达国家擴張方面采取了一些狡詐的手法。

首先是标榜同不发达国家的所謂“伙伴关系”。德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丧失殆尽。战后西德帝国主义竭力宣傳自己是“非殖民主义国家”，标榜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所謂“伙伴关系”，它甚至宣称贊成扫除英、法、比等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統治，借此排挤它的竞争对手，欺騙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然而，欺騙宣傳并不能掩盖西德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实质。艾哈德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曾說：“德国（西德）企业必須越来越多地把出口轉为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在新兴国家開設分支企业……許多新兴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人力后备，丰富的資源和有利的地理条件，替每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企业家提供了理想的前提。”^①西德壟断資本在“伙伴关系”的幌子下，巧立种种名目向不发达国家进行資本輸出和商品傾銷，掠夺这些国家的財富，剝削这些国家的人民。西德同一些不发达国家所簽訂的“投資保护协定”和

^① 西德《联邦政府新聞情报局公报》，1960年11月18日。



“免征双重税协定”，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到今年五月为止，西德已先后同巴基斯坦、马来亚、伊朗、希腊和多哥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规定西德在这些国家开设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有同等权利，西德在当地企业中投资的股份不受限制，只有在等价赔偿的前提下才能没收西德的财产，而且必须经过法律手续审查等等。西德还同印度等十六个国家签订了“免征双重税协定”，使西德在这些国家的企业和资本享受税收上的优待。

其次是通过“技术合作”和“文化合作”扩大西德的影响。西德在伊朗、伊拉克、西班牙、希腊等国家设立了技术学校。在希腊、土耳其、约旦、泰国和利比里亚等十六个国家设立了“示范性”的工厂和农场。在许多国家设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諮詢处”，如在阿富汗有“水文服务处”，在苏丹有“植物保护处”。西德的“联邦地质调查局”更在七十多个不发达国家设有“服务处”、派有“勘测队”或专家，其任务是替西德垄断资本摸清资源情况。西德帮助印度钻探石油，条件便是“如果发现石油蕴藏，联邦共和国本身将参加开采。”^①西德还在国外设有一百二十三所德文学校，并且与不发达国家大量交换留学生和实习生。此外，西德还准备仿效美国的作法，派遣所谓“和平队”前往不发达国家进行活动。

再次是放宽投资和贷款等方面的条件来排挤竞争对手。在给予不发达国家信贷方面，西德自恃拥有大量黄金外汇储备，不顾帝国主义国家一九三四年关于资本货物出口信贷不得超过五年、消费货物出口信贷不得超过半年的“伯尔尼协定”，而通过“债务延期”等

方式予不发达国家以五年以上的长期信贷。同时，政府对出口信贷的担保适用于一切出口部门。对于不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帝国主义一般采取阻挠的态度，特别是不愿意这些国家的钢铁工业得到发展。西德也竭力鼓吹不发达国家应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先发展小型企业，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重工业也提供一些“援助”，以便打入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美国向不发达国家投资往往以这些国家不实行国有化为前提，而西德则不坚持要求不进行国有化，只要求得到所谓合理补偿的保证。

西德帝国主义不仅在争夺西欧经济霸权和向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扩张，而且在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西欧政治上的霸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德的军事扩张活动也正在日益加强。西德现在已经成为西欧大陆兵力最强的国家。十二年来，阿登纳政府一贯追随美国制造“冷战”，要求恢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德国疆界，拒不承认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奥得河和尼斯河边界，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收复东部失地”。西德帝国主义一方面正在加紧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同时，它又在准备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战争的借口之下，加紧向西欧进行军事扩张。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西德帝国主义已经构成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但是，今天的国际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大不一样，美帝国主义扶植并勾结西德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一切阴谋必将失败，其结果将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① 西德《每日镜报》，1959年7月5日。

